

# 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旨趣的偏离与回归

刘旭东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发展相互砥砺。尽管人文学科以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为研究对象, 但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对人文学科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对科学的偶然性、情境性的揭示, 人文学科研究要超越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 以提升人性为导向, 帮助人去感悟和体验生活的价值和意义。为此, 其研究方法要进一步彰显价值属性, 以问题解决为旨趣, 超越学科逻辑和框架的钳制, 在反思和行动中将重心转到内部世界, 转到对人的情感、意志及心理活动的关注上来。

[关键词] 人文学科; 研究方法; 演进

[中图分类号] G 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779(2015)05-0051-07

DOI:10.13749/j.cnki.cn62-1202/g4.2015.05.012

通常, 可以按领域将人类知识领域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 其中, 人文学科是一个有独特性的学科领域。《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它是这样解释的: “人文学科是那些既非自然科学也非社会科学的学科总和。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构成一种独特的知识, 即关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人文主义的学科。”<sup>[1]</sup>在此, 深刻地揭示了人文学科的旨趣是揭示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人文学科有悠久的历史, 它并不是单打独斗地演进和发展起来的, 它的发展历程反映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状态及精神价值的深深的关注及其认识的不断提升, 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它们之间从一开始的松散的联系到后来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它也将自身定位于“作为知识的科学”, 研究方法步所谓规范科学的后尘, 乃至到今天对两者关系具有元意义的反思。在研究方法上, 人文学科在不断汲取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优点和长处过程中实现改进和完善, 但曾几何时, 人文学科机械地移植所谓成熟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对人自身价值、存在状态以及精神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关注, 招致来自多方面的指责和批评。今天, 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转向对“作为实践的科学”的研究, 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在发生时代转

向, 人文学科也在努力彰显自身的学科特性。为此, 认真探究自然科学在人文学科研究的演进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对于更全面地把握人文学科研究发展与演进的规律是有意义的。

## 一、古典人文学科研究方法的旨归

即便是在今天, 没有人会轻视人文在社会进步发展和人类成长的价值和意义, 有关人文话题的讨论如火如荼, 但对“人文学科”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解仍然存在歧义。有人认为“人文”不是科学, 也有人坚持“人文主义”的表述, 当然, 也有人认可“人文学科”这个概念<sup>[2]</sup>, 各种观点林立, 不一而论。我们无意介入到争讼之中, 但从中可以看到源发于古希腊的“人文主义”是具有鲜明特性的研究领域, 对人文及其相关方面的研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脉络和发展轨迹。回顾人文学科主要的研究范式的历史轨迹和厘清其受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影响程度, 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人文学科研究的特性并清晰地把握自然科学对它的影响。

古典人文主义者多倾向于以生活的观点, 或者至少是由生活出发诠释其有关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的主张, 正如西塞罗所指出的那样, 人文学科的目的是“发挥那些纯粹属于人和人性之品质”<sup>[3]</sup>,

[收稿日期] 2015-08-25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4 年度国家一般课题“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教育的学术传统研究”(BAA140016)

[作者简介] 刘旭东 (1964—), 男, 广东揭阳人,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课程论研究

这表现为人文主义者本人多是社会生活中积极的行动者，他们往往以入世的态度来看待人性与社会，置有关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的框架来讨论，主张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天然地与生活结合在一起，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及其价值并努力地将理想实现于生活过程之中。在这一点上，无论是我国古代的“愤启悱发”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法都呈现了鲜明的人文特征。“愤启悱发”是孔子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人文研究的方法具有不可多得的启示意义。孔子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其所揭示的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启发诱导，更重要的是对其所包含的通过人与人之间相互砥砺激活其生命意识的特性的准确把握。“愤”和“悱”不是一般意义的心理感受，而是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中被激发出来的具有强烈探究冲动和张力的心理状态，假如没有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这种状态就无法被激发，也就谈不上“启”和“发”。因此，“愤启悱发”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人的逻辑推理能力和知识水平，而且还凸显了只有通过活动和交往才能生成的情意状态的价值和作用。换言之，如果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沟通和交流，既无法到“愤”和“悱”的状态，也就谈不上“启”和“发”。而作为苏格拉底法的原创者，苏格拉底以自己的方式践行对话的方法，通过哲学式的探究，以帮助人达到丰富和充实生活的目的，并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践行自己的主张，为自己的信念而殉道，以致黑格尔说：“我们佩服他有一种道德上的独立性，他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坚持不屈，既不变其操守，也不承认自己认为公正的东西是不公正的。他因此冒着被处死的危险。”<sup>[4]</sup>上述内容说明，古人对于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有着深刻的认知，古典人文学科的研究是基于那些对社会、人生有深刻洞察力和感知力的先贤的个人自省感悟和积极行动实现的，具有鲜明的个人化色彩，对此，永恒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有很深刻的认知，它们认为，人类永恒的道德问题体现在先哲们的伟大思想和著作中，它表达了正确的思维方法、有关宇宙的根本观念和对人生的真知灼见，体现了人类应该考虑的永恒原则和思想，是我们今天抵御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和精神武器，它们富有别无二致的理智训练价值，为此，主张用古典名著去发展人的理性，自由艺术教育塑造人文精神的主要方法和内容，为此，发出了“像古代人思考的那样

思考”、“回到古人那里去”、“和古代伟大人物的思想取得接触”的呼吁，企望以将心比心的方式来实现人文价值的传承。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对“行动”做出非常精辟的诠释，准确地揭示了行动的人文本性。她说：“行动是唯一无须事或物的中介而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活动。”<sup>[5]</sup>认为“行动的人能够揭示他们的自我，或者更具体地说，实际上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揭示自我，是与他人一起、为了他人而进行活动和交谈（行动）。”<sup>[6]</sup>在此，她深刻地挖掘了行动的人文意义，强调行动的沟通交流属性在展现人的本质力量中的独特作用。基于这样的理解，人文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是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言行展现自我并据此影响民众，这也是他们开展相关研究活动的主旨。依据阿伦特的见解，行动是古典人文学科通常采取的研究策略，表现为人文主义者往往是通过“聚集在一起分享言行的民众”<sup>[7]</sup>来传播思想、宣传自己的主张以达成自己的目标，或者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主张。人文的价值都是在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和交谈中发生和实现的，源发于此的研究方法具有无以伦比的人文气质和道德力量以及对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类的价值和精神的恰当把握，放射着永恒的人性光芒。在古典人文学科兴盛和产生影响的时期，自然科学还处于酝酿阶段，使得古典人文学科在对人文现象的认识和解释过程中保留着浓烈的原生态色彩，自然科学对古典人文学科的影响力还极为有限，后者很少受到外在的其它学科性因素的影响，突出体现在鲜有以主客二分的方式将人类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客体化或以客体化之物（如知识等）来置换人与世界、人与生活的关系的现象。当然，由于手段和方法的不足，此期的人文研究在富有反思和感悟性的同时，不免产生主观色彩浓重、研究方法还不够丰富等问题。

## 二、近代以来人文学科研究路径的偏离

近代以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先后从哲学中分化出来，逐渐出现了自然、社会、人文等学科门类的差别。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期待对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以及人本身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因此，学科门类的划分越来越细致。与此同时，经启蒙运动洗礼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充实，理性主义成为17世纪以后现代化思想和运动的中心原则，成为此后解决

包括存在、知识、真理乃至人生观和世界观等在内的所有关涉自然、社会、人生领域问题的根据和准则。在这一点上，理性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笛卡尔、黑格尔等人的观点很有代表性。笛卡尔恪守统一的科学观，认为科学的统一性不在于研究对象而在于方法、数学推理及其处理经验材料的精确性和可靠性，并将此作为哲学研究的目标和其所倡导的“新科学”的本质特征。而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被认为是万事万物的最后根据和本质，宇宙是其的外化和表现，它经过漫长的辩证运动后又回归到绝对精神那里。受这些思想的影响，“理性万能”、“理性至上”成为此期盛极一时的思想观念。

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对近代以来的人文学科研究的演进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主体被发现和主体性开始觉醒使之步入“致思”和弘扬主体性的领域，“我思故我在”的价值理念使之倾心于从某个既定的逻辑端点出发做严密的推理演绎，以期以完整系统的方式把握人与社会，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人文学科研究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第一，自然科学崇尚事实的价值取向逐渐成为人文学科基本的科学精神的组成部分。理性主义怀疑一切、崇尚事实和逻辑的思想方法使得科学理性也成为人文的主要内涵，它由此摆脱了一味臆想思辨的窠臼而转向强调对人文现象的研究要以事实为基础、有证据支持，讲事实、重证据、逻辑化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的表征。第二，崇尚人性，关注世俗生活的合理性的肯定。在理性主义影响下，人文学科破除了封建迷信，打碎了宗教的神圣光圈，其研究路径和方法经过扭曲人性的中世纪以后逐渐回归到对人自身的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重要内容。第三，形成了严谨求实的研究规范。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推动了以效率为中心的科层管理制度和有严格程序的学科制度的生成，人文学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规则和研究规范，进而得以确立自身的学科地位。

人文学科的发展深受自然科学的影响。自然科学的迅速崛起转变了人们对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认识与态度，也转变了人文学科研究演进的路径，对此哈耶克（F. A. Hayek）曾说过：“对自然科学成就的这种自豪感，以及对其方法万能的信念，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有着无与伦比的正当性。”<sup>[8]</sup>它深化了人们对人的精神、信念和内在情怀的把握和理解，人文成为与科学同步并相互交织和发挥影响的重要力量，它们共同成为推动人类进

步和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或缺的领域。例如，受自然科学研究向往准确性和逻辑性的影响，近代以来，一度被忽略的归纳实证方法被重新认识和发现，恪守可证实性和逻辑性原则成为人文学科研究的基本规范，观察以及基于归纳实证的认识程序被认为是人文学科的基本的研究方法，以求由此获得对有关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合理诠释，诸多得到充分运用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如实验法、统计法等陆续在人文学科研究中被采用，尤其是冯特于1879年在莱比锡大学创建了第一个心理实验室，使心理学转变为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独立学科，成为人文学科研究从传统的哲学思辨的桎梏中解脱出来的典范，于是，自培根以后形成的实证的研究方法逐步进入其中，以“无涉”为取向，推崇证据的搜集，人文学科研究开始仿效自然科学的路径和方法，试图在与社会生活有关的各变量的相互关系中引伸出因果法则。在这种思想主导下，任何与人和人社会有关的现象都被认为可以被分解为不同的变量，都可以通过建立数学模型的方式建立统一的系统知识，研究过程是从对个别的、细小的变量的考察开始，以求获得更多的客观知识，量化方法得到了广泛运用，英国科学史家J. D. 贝尔纳在评论教育学的发展时也说：“教育学具有科学气味并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是由于智力测验引进教育学中了。”<sup>[9]</sup>逻辑实证主义是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思想基础，盛行的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对人文学科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文学科逐步摆脱不考虑实证的证据而一味思辨的思想方法，它开始努力地消解自己的知识类型和性质的特殊性以求与逻辑实证的研究方法趋同，使其研究的主题、方法和内容得以更加多样化和丰富化，对人文现象的把握不再是像以往那样仅仅凭个人的臆想和思辨，方法和证据意识在人文学科研究中获得了它们独特的地位。

然而，由于近代以后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滥觞，利益和绩效优先的生活价值观开始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模式化的倾向使人文学科研究渐渐淡漠了对人的精神和价值尊重，人文学科的边界被销蚀，它似乎失去了自身特定的学科立场，如罗素所揭示的那样，如果自然学科、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有区别，那只是发展程度上的差别，但它们在方法论上具有统一性，人文学科研究没有独立的方法，只能采用自然科学的标准和方法。与此同时，它更加关注客体化的事物，对可证实性和逻辑性的倚重也使它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与古典人

文学科相比，理性主义思维方式主导下的人文学科在研究过程中对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把握与人类价值和精神本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不相一致，多是采取浮于体悟之上的逻辑推理的方式，缺少了直通人性的功能和以往的那种厚重感，出现了线性化、数量化的色彩，这使得一味依此而展开的人文科学研究中蛰伏着诸多令人失望的方面。其一，人文科学的内在价值被忽视，远离了以天下为己任、关注人的精神和价值追求的情怀，而是像所谓“纯科学”那样致力于培养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这些专家虽然具有较强的研究和思想表达能力，但他们往往是在许多“很小的事情上面知道得很多”的人<sup>[10]</sup>，他们被喻为只是人文科学的一些高级的“技术员”而已<sup>[11]</sup>。其二，可证实性原则与个人经验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之间矛盾的困扰。由于个人的经验结构是主观的，不具有普遍意义，实证原则无法对其进行证实，由此决定了人文科学研究对象是历史的、伦理的、哲学的、美学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必然要相异于自然科学研究求实证、求逻辑、拒斥形而上的特性而具有情感性、理想性。然而，近代以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推崇使人文科学由古典的以行动为内涵的学术性活动逐渐变异为一种试图探寻人类精神世界的普遍规律的活动，导致对人类价值和精神表现的的目的性及其活动过程所做出的说明牵强和软弱无力。其三，人文科学的要旨是理解并诠释人文事件的意义、说明和预测人文事件发生的原理。逻辑实证主义试图用其固有的因果关系的思维方式将所有人文社会现象及其发生过程都纳入其方法论框架中并做出解释，它将对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起主要作用的元素视作“变量”，再把“变量”间的数量关系找出来用数学方程加以描述，这样固然可以使一个复杂的系统得以化繁为简，但却必然忽视了对其中心理的、社会实践的和历史性的因素的关注，明显地与人文现象的本性相悖。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作为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对数学方法的推崇盛极一时。然而，数学方法自身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对意识和精神的把握。<sup>[12]</sup>但近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研究中却时时出现滥用数理方法的现象，这引发了诸多的困惑和焦虑。

### 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当代转向与人文科学研究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是对 20 世纪的人文

学科研究有重要影响的事件，改变了以往以逻辑实证和程序化为特征的自然科学化的发展路径。相对论把引力场确定为新的“独立的实在”，冲击了牛顿的实体观，而量子力学则以更为猛烈的力量冲击了主客体绝对二分的实体主义原则。以往，牛顿力学理论认为人能够同时准确地测定一个运动的物体、把握它的动量和位置，他的这个观点也被引入到社会和人文领域，似乎社会和人文领域也是如此。但维纳·海森伯格 1927 年提出的测不准原理则认为，我们虽然可以通过实证的手段知道一个粒子在哪里，但却难以准确地把握它的运动速度；或者我们知道它的运动速度，但却难以准确判断它的位置，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在量子事件中所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同时准确地测量到微观粒子的动量和位置。根据量子力学理论的思想，人的生存状态并非像牛顿力学所描述的那样是确定的，相反，它具有多种可能性，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过是丰富多彩的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无穷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既然如此，被理性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推到极致的确定性思想和定量方法在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滥觞将销蚀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如果人文科学研究桎梏于确定性的牵绊，就无法揭示人的发展的多种可能状态，也无法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人的本性。在这样的思想文化的影响下，传统归纳法和经验验证、逻辑分析的方法的有限性逐渐暴露，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性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前提及信念开始动摇，迫使人文学科研究再次发生时代转型。在这方面，人类学研究方法的转型很有代表性。

作为新兴人文科学，人类学研究在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的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经验描写和成果表述的规范性。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民族志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它所描述的是社群文化的文字或影像，反映的是文化人类学的本质。这是在田野现场的基础上通过观察和参与而开展的“关于民族的写作实践”<sup>[13]</sup>，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当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产生的变化，以此来理解和解释社会。依照百度词条的解释，诸如：观察与参与观察、相处共话、访谈、系谱法、重要文化报道人、生命史、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问题取向的民族志研究、长期研究、团队研究、调查研究等是其主要的研究方法。<sup>[14]</sup>这些方法就其具体内涵而言存在着差异，但共同点是深受自然科学实证取向的影响<sup>[15]</sup>，犹如阿兰·巴纳德将民族志研究归纳

为四个要素：“问题，假设，方法，证据。”<sup>[16]</sup> 这些方法强调证据意识，关注对具体田野情境的深度刻画，具有浓重的实证的品质。因此，民族志既是一种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人文学科研究方式，也是一种展示文化的过程与结果，散发着讲求证据、凭事实说话的学风。由此可以看到，在超越逻辑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以后，对于人文学科的研究吸收了实证的方法要素，在研究过程中遵循仔细地观察和记录一切事实并对其进行分类和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归纳并得出一般性的结论，验证一般性的结论的基本程序。这种具有实证色彩的研究程序是基于“价值中立”的立场设计的，其关键点是在观察记录和得出结论时要排除任何的猜测和预设，以避免前见影响观察和分析的客观性。然而，它又不是简单地套用自然学科从问题开始的研究程序，而是强调缜密的观察和在经验事实中去验证，研究的路径是归纳实证。这表明人文学科研究能够虚心从科学中汲取营养，逐步扬弃以往那种完全以数量化的方式表达本学科的确切性、逻辑性的范式，规范和深化自己的研究，期待以自身独特的方式来表达实证的理念，人文的理念开始渗透到其研究过程中。

综上，当代自然科学研究的思想和方法建立在量子力学、相对论基础上，相异于经典的自然学科，受其影响，当代人文学科研究开始发生显著的变化，主要特点是：第一，充分揭示人文现象的生活本性。在走过追求确定性的阶段以后，当代人文学科逐步把握了其研究领域的丰富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性，试图揭示生活的流变性和生活情景的不确定性，特别关注人与社会活动过程中出现的偶然性，正如埃德加·莫兰所说：“认识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海洋里穿越一些确定性的群岛的航行”，“永远是一种探险”，所以“不确定性杀死简单化的认识而成为复杂认识的解毒剂”。<sup>[17]</sup> 当然，人们也认识到，人文学科有自己的边界，它的功能的发挥和展现有赖于自然科学的支持。如果人文学科一味做无休止的本质主义式的自我追问，无视人的存在的客观性和法则，就有可能破坏人的存在的确定性基础，这是人文学科研究必须要具有的自我认知。第二，通过规范自身的研究范式而保持与自然学科间的内在关联。人文学科的研究策略和方法是历史、伦理、哲学、美学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的产物，它直指疑难情境，直接服务于问题解决，但它又不与自然科学实证的、逻辑的和体系的研究方法绝然

对立，以往那种在自然科学研究规范影响下为方法而方法的研究路径被抛弃。人文学科研究在任何地方都会看到人且向着人展开，并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发挥着渗透和涵摄作用。第三，它更加关注行动之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现的作用。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人的本质力量得以展现的必需条件，而行动是唯一可以在无需其他中介帮助下人与人之间得以直面相对并能揭示自我的活动。行动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的专注的投入，它的功能的展现首先取决于行动者的具有谦逊和虚心的态度，能够以最大的开放性接受一切外来的意见，同时具有探讨和商榷的能力，由此才能够形成情境中的动态的互动，进而在包容和开放中改变自身和他人。由此，行动被赋予了很高的人文价值，其对人的发展的影响是无以取代的。当代人文学科在追求形而上的探索的同时，对于行动的价值和意义也予以了深刻的认识，由此作为思考人文学科的发展轨迹的基点和技术路线。

#### 四、人文学科研究方法旨趣的回归

人是情境性和时间性的存在，其存在的价值也是在实践中通过改造自身及其生活的实现的。人独特的存在方式决定了他在本性上拒绝僵化的实体性生活样式和片面的发展状态，期待能够从被遮蔽的状态和在世界之中真实地敞现自己，他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解读、表达和重构着文化的意义并创造和生成着新文化，由此体现出人要求全面占有自身本质以及拥有完整生活的内在渴望。但工具理性的泛滥却导致当代人的生存方式被严重地物化。要改变这种状况，准确和全面地把握人的价值和精神世界，人文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担负着剔除蒙蔽、使人回归到自己的本真状态的重要使命，为此必须拓展其研究路径，丰富研究方法。基于这样的认识，对人文学科的研究做出如下展望。更加彰显研究方法的价值属性。随着对精神和人的内在价值的认识的不断提升，人文学科研究将摆脱主客二分的思想方法而更加关注人的内部世界，研究重心将转移到人的情感、意志及心理活动上并对这种关系的意义结构做出富有说服力的表达，进一步凸显其富有张力的那一面，犹如在讨论教育问题时有人指出的那样：“教育不是一种可以预料的活动，它不像工程计划那样，人们能够准确地预测其结果。虽然信任是教育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是由于被信任对象的行为是自由的，因而其效果是无法预料的，并不

如自然规律那样具有必然性。所有信任都可能会落空。这就是教育意图的失败。”<sup>[18]</sup> 为了能够全面深刻地把握人的价值和精神表现，人文学科研究要具有开放性，在恪守一定的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在研究的过程中不断超越既定的人为性因素的制约。不过，强调人类的价值和精神并不意味着对自然科学研究方式的抛弃，实证性、逻辑性的方法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它们的悉心掌握和恰当运用是透彻地了解和认识人类的价值和精神所必需的。科学精神也是人文精神的内在组成部分，与人文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把科学和人文简单地二元对立的思想方法并不符合人的发展的需要，这就是说，人文学科所采用的任何研究方法都要以从属于其本有的价值目的和学术规范为前提，尊重个人的特殊性和生活经验的具体性，强调以准确翔实的方式再现各种人文现象和事实的本来面目，充分理解人文现象所包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并对其作出个性化的诠释，而不仅仅是对相关因素或变量做出分析。为此，人文学科研究在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同时，要更加充分地关注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表现，并以恰当的方式来展现这种关注。

研究方法的选择以问题解决为基准。人们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的形形色色的问题都是具体的、发生在特定情境中的，对它的认知和解决问题方法的选择都要因情境而异，由问题解决出发选择方法，以更好地面对现实、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区别于社会科学以人类的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群体作为研究对象，人文学科表达和研究的内容更多地涉及个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较之于前者所具有的宏观性、抽象性，后者在研究某个特定的对象时，总是力图在多种因素的统一中来具体地把握它，研究的策略和方法具有情境性和个别化色彩。因此，人文学科研究要通过对人性中本有的鲜活性和开放性、具体性与内在性的唤醒，揭示人和社会现象的变化性和丰富多彩性，尤其是人对自身价值和精神的反思与感悟，以求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其它学科研究新视界。

超越既有学科逻辑和框架的钳制。人类的价值和精神是随着不同的时代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事实，对它的研究不能以获得最终知识、绝对真理为依归，不能桎梏于学科的自我封闭界限之中。学科知识体系的划分只是人们出于认识世界、进行科学研究的便利使然，而不是生活和世界的原生态，人文

学科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尊重既有的学科规范，但又不能囿于此，它要突破学科的束缚转向以问题为中心，采用历史、批判和革命的思维方式去揭示人类的价值和精神。这就意味着人文学科不能像某些学科那样把人类的价值和精神桎梏于某种既定的模式、框架或学科逻辑之中，也不能以构建某种理论体系为标准来解释它和以此呈现知识和解决问题，而要从以往企图在某种意识的明证性、绝对的确定性基础上构造有关人类的价值和精神的永恒学说的立场转向对人的实践活动和具体生存境遇的关注，转向对于解决疑难情境中所出现问题的关注，在研究范式上重构人与生活世界的关系，摆脱研究者与周围生活世界的分裂与对立，从人自身的角度和立场对人类的价值和精神的诗意表现与对自身存在的价值的感悟体察做出新的诠释。

践行人文的反思和行动性。在人文学科的视野中，人类的价值和精神是历史、文化、等多重意义整合的意蕴总体，它向每个人开放，每个人都可以倾听、分享和感受它，如同现象学所揭示的那样，对这样的意蕴总体的完整把握需要采取本质直观或原始体验的方式，而不能以主客体二分的思想方法去把握它。只有在实践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体验和感悟，人们才能领略其价值和意义，理解生活和存在。但是要看到，犹如海德格尔所揭示的那样，人是被抛入世界的，任何生活都必然基于某种前提展开，但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任何现存之物固然是我们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它只能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是可资人与社会活动利用的素材，而不是无可选择的事情。生活世界的价值是否得以充分展现有赖于对这个前提做出深刻和全面的反思和澄清，否则，就有可能因为这个前提的局限性而使人与社会价值的认识陷于目光短浅的巢穴中。这就要求人文学科在研究范式上必须以深层地介入实践、关注人存在的交互主体性为导向，不简单地以现存的人与社会事实或人与社会知识作为其展开研究或思考的必然前提。为此，在研究人文现象时，要能够自觉地对行动的前提做出反思，杜绝知识目的的研究，在行动中把情境中的各种异质性因素整合起来。有人指出：“有‘说’者的存在，‘听’才有可能；有‘听’者的存在，‘说’才有意义，并且只有听者积极地反馈，‘说’才能变得更为精彩。”<sup>[19]</sup> “说”者和“听”者辩证统一的存在关系，说明人文学科的学术使命不仅仅是“看”或“思”人类的价值和精神，也不仅仅是“言说”或“交流”人类

的价值和精神，更是要能够积极地反馈，“介入”和通过积极的实践来提升人类的价值和精神，因此在研究范式上不仅要把人类的价值和精神当作被

“看”和“思”的对象，更要把它作为“做”本身，在做的过程中实现人文学科的价值追求。

#### [参考文献]

- [1]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第6卷) [Z].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86: 760.
- [2] 胡立耘.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及其通称术语的由来与非规范性现象探讨 [J]. 宁夏社会科学, 2005: 9.
- [3] 艾伦·布洛克. 西方人文主义传统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7: 5.
- [4] 黑格尔. 哲学史讲演集 (第二卷) [M]. 贺麟, 王太庆,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102.
- [5] 王寅丽. 在哲学与政治之间: 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 [D]. 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59.
- [6]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M]. 刘北成,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60.
- [7] 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阿伦特为什么重要 [M]. 刘北成,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9: 62.
- [8]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 [M]. 北京: 译林出版社, 2003: 113.
- [9] 张诗亚, 王伟廉. 教育科学学初探 [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41.
- [10] 贡布里希: 理想与黄昏 [M].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9: 190.
- [11] 绍伊博尔德.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 [12] 成智荣. 试论笛卡尔方法的演变及其意义 [J]. 理论观察, 2009: 3.
- [13] 阿兰·巴纳德: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4.
- [14] <http://baike.baidu.com/view/744379.htm>.
- [15] 陈向明. 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 [M].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13.
- [16] 阿兰·巴纳德: 人类学历史与理论 [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6: 5.
- [17] 莫兰.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1, 68.
- [18] O·F·博尔诺夫. 教育人类学 [M]. 李其龙,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47-48.
- [19] 李盼君. 书写文化遮蔽下的口传艺术 [J]. 柳州师专学报, 2010, (6).

## Deviation and Return of Humanities Research Methodology

LIU Xu-dong

(College of Education,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that of science interwine and encourage each other. Humanities focuses on human value and human spirit, but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science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humanities research. As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discloses the contingency and situationality of science, humanities research should transcend the science research mode. And it should be humanity-oriented and help people to feel and experience value and meaning in life. Therefore, the research methodology of humanities should manifest value features, with problem solution as its principle, breaking the limitation of discipline logic and framework, with reflection and action, shifting the focus to inner world, human emotions, willpower and psychological activities.

[Key words] humanities; research methodology; 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张永祥/校对 一心)